

甚麼是中國的「後新時期」？

• 徐 賁

《二十一世紀》這一年多來所刊載的討論後殖民、後現代批評話語在當今中國現實環境中的理論意義和政治傾向的文章中，有一個已被點到卻尚未深及的問題，那就是「後新時期」概念。這是一個在中國「後學」理論中至關重要的概念。中國的「後新時期」是在中國提出後現代和後殖民理論合理性和必要性的歷史依據，這一點張頤武說得最明白：「後新時期／新時期的斷裂已經顯現得十分清楚，以舊的話語方式闡釋中國大陸文化，已經被當下新的文化實踐拋棄。」^①正是由於後新時期的來臨，後殖民和後現代話語才具備了新興「文化實踐」和新式「闡述話語」的雙重意義。那麼，在中國「後學」中，「後新時期」究竟是一個甚麼性質的概念呢？它本身又具有怎樣的理論意義和政治傾向呢？作為一個歷史分期命名，它是否真的揭示了當今時代的歷史特性，明確提出了社會文化批判的對象和任務？這些問題也許能從另外一些方面來幫助我們深入對中國「後學」的討論。

一 「後新時期」的命名

1992年，當「後新時期」被當作一個新概念提出來討論的時候，它還只是一個用來描述1989年以後「文學」轉型的概念。當時，使用「後新時期」概念的論者對「後新時期」文學究竟包括了哪些內容甚至歷史時期的劃分，有着明顯相互矛盾的說法。王寧認為，「後新時期」（1990- ）與「鼎新時期」（1979-1989）的文學是「逆向相悖」的；「後新時期」文學的「挑戰性」和「叛逆性」則有三種表現：「先鋒文學」（「〔它〕的激進實驗構成了對新時期人文精神的有力挑戰」）、「新寫實文學」（「〔它〕是對傳統的現實主義原則的叛逆」）、純文學和通俗文學並存（「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的結果）。張頤武同意王寧對「後新時期」的歷史分期，也同意王寧把「人文精神」確定為「新時期」的說法，但他把「實驗文學」和「後新詩潮」這樣的激進實驗劃在「新時期」而不是「後新時期」之內。他提出了「後新時期」的另外兩個特點：第

一，「『後新時期』的文學是一種『回返』性的文學，文學開始重新尊重法則和倫理，不僅尊重敘事的法則，也尊重現實的法則」；第二，「『後新時期』文學具有某種第三世界後現代性的『多元混雜』的特點。」（這種「『多元混雜』的特點」並不妨礙他接着又說：「『後新時期』……是整體性和秩序復歸的時刻。」）王寧和張頤武都試圖在「後新時期」和「後現代」之間建立某種平行的聯繫，王寧主張將「後新時期」確定為一個文學概念，但張頤武則有意將它擴展為一個文化概念。當時參加討論的趙毅衡與他們的分歧更大，他強調「後新時期」不是用以在「時間」上和「政治」上與「新時期」相區別的概念，「後新時期」純粹是為了說明「文學的發展也有其獨立的規律可循」。而且在時間上，趙毅衡也認為，「後新時期」大約從1985年新潮小說發端時就開始出現，而在1987年先鋒小說成形時成形^②。

到了1994年，王寧和張頤武對「後新時期」理論作出進一步解釋的時候，更強調這個概念的「文化性」和與「後現代」的聯繫^③。隨着這個概念範圍的逐漸擴大和這兩年間文學新樣式的出現，「後新時期」理論闡述中出現的矛盾也增加了。例如，1992年張頤武把「新寫實」說成是「後新時期」的典型文學形式，以區別於「新時期」的「傷痕文學」一類的作品；1994年他改口把「新寫實」說成是「新時期」「『寓言』式」文化邏輯的體現，而把「新狀態」小說確立為「『後新時期』文化發展最重要部分」。1992年他還說「『後新時期』的文學是一種『回返』性文學，文學開始重新尊重敘事的法則」；1994年他則改口說「後新時期」文學中出現了「深刻的『敘事危機』」^④。這一

類自相矛盾的說法並不是偶然的，它們都顯示，「後新時期」論者總是在歷史時期和文學作品樣式之間建立某種一一對應的關係，用「特殊」的文學樣式來證明歷史時期的特殊性。但事實上，文學樣式和歷史時期之間並不存在這種一一對應的關係，這是因為文學樣式本身就不是絕對的。特定文學樣式的不同因素以及它們的淵源和承繼，總是跨越不同的歷史時期。而且，文學樣式的特殊性不是內在的，而是與它們作為社會意義的產生和流通的環境聯繫在一起的。不同的歷史時期完全可以具有多種相同或類似的文學或藝術樣式，而這些相同或類似的文藝樣式和現象，也會在不同的時期因其與不同的社會政治環境的聯繫而具有不相同的文化意義。文學批評家的任務正是要將文學現象與具體的社會環境（也就是創作者和接受者的現實生存世界）聯繫起來，以揭示文學現象是在甚麼樣特定的環境中產生甚麼樣特殊的效果的。

「後新時期」是作為一個有別於「新時期」，並對之「挑戰」、「叛逆」以至「超越」的歷史時期提出來的。「後新時期」理論常常使用「挑戰」和「叛逆」這類說法，似乎顯得它很想成為批判性文化理論，但它卻明顯地缺乏理論介入實際生存處境的意識，避免觸及社會政治一類的敏感問題。這從它對「後新時期」的年代劃分就可以看出來。它迴避了在政治上敏感的1989年，而討巧地把1990年定為這個時期的開端^⑤。對於任何批判性理論來說，對一個歷史時期的性質的認識必然包含着明確的批判性價值判斷。因為它所關心的是這個歷史時期中人們的基本生存狀態是甚麼，他們生在甚麼樣的權力關係之中，面臨着甚

「後新時期」概念是在中國「後學」理論中至關重要的概念。當1992年被提出來討論的時候，它還只是一個用來描述1989年以後「文學」轉型的概念。當時，論者對「後新時期」文學究竟包括了哪些內容甚至歷史時期的劃分，有着明顯相互矛盾的說法。

中國「後新時期」理論迴避了在政治上敏感的1989年，而討巧地把1990年定為這個時期的開端。以1989年還是1990年為界限來區分「新時期」和「後新時期」，這對理論的批判取向有很大差別。



麼樣的結構性壓迫形式，需要如何對抗這些生存壓迫，這種對抗又具有怎樣的道德合理性，等等。以1989年還是1990年為界限來區分「新時期」和「後新時期」，這對理論的批判取向有很大差別。

歷史「事件」在歷史性思考中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重大歷史時刻都包含兩個基本方面：發生 (genesis) 和規範 (normativeness)。「事件」的發生時刻並不是絕對客觀的，每一個事件都是由許多可以稱為「發生」的時刻所構成的，歷史學家確定其中的某一個為特別「重要」或特別「有意義」，這已經是在對「事件」作規範了，而任何「發生」的確定，本身都在某種程度上限定「規範」的導向。即使對同一「發生」，也總是會有不同意義規範的爭奪。「事件」的「發生」和「規範」總是在互相制約，互相起作用。「事件」的「發生」和「規範」之間的這種關係就是它的「起始關係」(originary relation) ⑥。

「起始關係」不可能是絕對客觀的，它永遠是特定的人們在歷史中對歷史的解釋和運用。真正具有歷史意識的文化批評(好的文學批評應當是這樣一種文化批評)，應當責無旁貸地說明，它所論及的歷史時期是由怎樣的歷史事件及其怎樣的「起始關係」所構建。如果「後新時期」理論家要我們接受「後新時期」概念，他們至少應當告訴我們，怎麼去理解和認識「後新時期」起始關係的「發生」和「規範」的特定內容，以及這二者之間有別於「新時期」的特殊關係。

我們發現，「後新時期」理論家在確定「新時期」的歷史特殊性時，真正起作用的其實正是某種歷史事件及其「起始關係」。王寧告訴我們，「新時期」的發生時刻是1976年10月的「粉碎『四人幫』的鬥爭」⑦。這裏的重大歷史事件是「文革結束」。在他這樣來表述這一事件的時候，他所涉及的已經不只是某一時刻的「發生」，而且也包

括了它的「規範」(意義)了。但是，我們也發現，「後新時期」理論家在確定「後新時期」的歷史特殊性時，這種起始關係卻被故意隱去了。「後新時期」理論家告訴我們，「新時期」的第二階段在1989年結束，「後新時期」於1990年開始，但他們卻偏偏沒有告訴我們，1989年中甚麼事件的「發生」和它甚麼樣的「規範」意義，使它的「起始關係」獲得了如此重要的一種歷史分期作用。

二 現代性的危機不等於現代性的瓦解

「後新時期」是相對於「新時期」而言的。「新時期」這個官方的說法是中國文化革命以後，國家權力所使用的一種自我表述。它在保持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結構的延續性的前提下作出一些新承諾，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現代化」的承諾。從一開始，中國的「現代化」就是一個由官方規定的，在有限範圍間的目標。官方權力的隱秘政治和社會政治現代性本身(公眾權力及公眾參與)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使得爭取現代性在中國不可避免是一個充滿危機的過程。當現代化過程從官方規定的科學技術領域向越來越敏感的政治體制和政治文化領域延伸和擴展的時候，它的結構性矛盾變得越來越尖銳。1989年事件便是這一危機的激烈演化和展開。這個事件對於官方和文化批評者來說，有着不同的意義，亦代表着不同性質的危機，因此所要求的分析和對待的方式也就不同。

1989年事件是一場政治危機，但也是現代性本身的危機。官方權力把

1989年事件認定為一場純粹的政治危機，這種性質的危機面臨三種威脅：「政權解體」、「政府行政失控」和「社會解體」(即所謂「動亂」)。官方的處理方法是將政體的危機轉化為行政的危機(處理不當、防範不力)，並以解決後者(讓某些人下台)來化解「政權」和「社會」解體的危機。而對於文化批評者來說，現代性危機這層意義更為重要。政治危機和現代性的危機這二者並不相互排斥，尤其是當我們把「現代性」看成是一個社會政治文化建設，而不只是科技發展或者體制改革的問題。文化批評不把1989年的危機看成是已經得到化解的純粹政治危機，而把它看成是結構性矛盾依然存在的現代性本身的危機。這一認識除了對官方對1989年事件的解釋具有對抗和批判的作用外，更重要的是對目前中國特殊的「現代性」提出了質疑，儘管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後現代時期」已經來臨。

這種對「現代性」的質疑是從兩個方面來說的：第一，1989年政治危機本身就體現了官方國家和公民社會在規範和解釋「現代性」問題上的衝突；第二，官方解決這場政治危機的手段和方式體現了中國目前特殊的「現代性」，那就是，官方動用了能夠確保強制性社會控制的現代技術和具有現代性話語性質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危機不同的是，現代性的危機並沒有那麼迅速地成為過去，它從1989年一直延續到今天，仍然是中國重新組織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所面臨的主要任務。對關心現代性問題的文化討論來說，1989年前後是一個轉折期，但這個轉折期至今仍未結束。目前文化討論的許多問題有的是前一個時期延續下來的，有的是新問題，但也有一些

對關心現代性問題的文化討論來說，1989年前後是一個轉折期，但這個轉折期並不如一些「後新時期」理論家所說的那樣，是按照學術討論自身邏輯的「深入發展」的結果，而是受到現存的社會制度的強大致約。

「後新時期」理論要與西方「後現代」理論建立「共時」聯繫，是出於借助後者對「現代性」的批判結論的需要。但就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現代性事業將能動主體、理性和政治倫理總述與民主公眾空間建設結合起來的理想，是值得文化批判去維護的。

重大的問題反而不再能討論。在這樣一種複雜的情況下，我們不能不看到，學術討論的轉型並不如一些「後新時期」理論家所說的那樣，是按照學術討論自身邏輯的「深入發展」的結果，而是受到現存的社會制度的強大制約。國家制度不僅可以直接控制哪些問題可以討論，討論到甚麼程度，甚至可以通過它的意識形態作用，使得學術研究者在意識或下意識中成為他們自己的「思想審查人」。在一定程度上說，「後新時期」理論本身就反映了這種外部限制和「自我審查」的作用。

我們應當如何看待「現代性」在當今中國的危機呢？哈貝瑪斯（Jürgen Habermas）曾指出，長期以來人們一直以戲劇的危機觀來認識制度的危機，認為社會制度本身的矛盾的衝突，一定引起「災難性的高潮」。中國官方把1989年事件當作一場政治危機來對待，所採取的就是這樣一種危機觀念。另一種觀點則把危機看成是在「解決問題過程中不斷產生新問題」的活性機制^⑧。現代性的危機也應當從它的建設性和更新作用來加以認識。1989年的危機非但沒有導致「現代性」這個「未完成的事業」在中國的終結，它反而向人們提出了關於中國現代性的性質、任務和條件的更深層、更根本的問題。就在這些更深層、更根本的關於社會和政治現代性的問題尚未真正被涉及，甚至它們的緊迫性和合理性尚未被充分認識和承認之前，究竟是在甚麼意義上宣布中國已經進入了「後新時期」？說進入了一個與「新時期」不再相同的「後新時期」，這是不是意味着中國社會改革中已經有了代替現代化的新的目標？如果是的話，那麼這個新目標是甚麼？看來，

這些都是「後新時期」理論所不應當迴避的問題。

「後新時期」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現代性」否定性的「再思考」上的。「後新時期」理論要與西方「後現代」理論建立「共時」聯繫，也是出於借助後者對「現代性」的批判結論的需要。「現代性」不僅在歷史分期上存在着很多分歧，而且對它的含義也有多種多樣的解釋。有的論者把「現代性」視為霸道的「理性」、「科學」或「總述」的同義詞，有的把它與不同的藝術潮流褒義或貶義地聯繫起來；而維護「現代性」價值者則重視它對人際交流的理性和獨立主體的肯定。

在當今中國的社會環境裏，強調「現代性」並不是要否定「後現代」的批判性，而是要指出，就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而言，現代性事業將能動主體、理性和政治倫理總述與民主公眾空間建設結合起來的理想，是值得文化批判去維護的^⑨。「後現代」理論真正對我們有所啟發的是對關於「現代性」的僵化觀念的批判：「後現代不是對現代性的簡單拒絕；後現代是對現代性的命題和概念作一番不同的調整。」^⑩後現代理論是一種文化批判，而作為文化批判，它本身就是一種典型的「現代」思想和思考行為。我們應當把現代性和對「現代性」的僵化觀念區分開來。「現代性」指的是這樣一種生活和思考方式：它對事物（包括「現代化」本身）抱着一種既歡迎變化又對變化採取審視的態度。如果我們把現代性看成是一種在現代化進程中呈現出來的積極而審慎的求變意識，那麼「後現代」批判（指積極的那種）本身就是「現代性」在某個關鍵時期的自我調整。關於「現代性」的僵化觀念（個人是自我完足的主體、科學理性凌駕於

批判理論、歷史和社會發展的鐵的法則、西方現代化是全球的普遍性模式，等等) 本身就是現代思想批判的對象。對於「現代性」的肯定，並不是要接受那些關於「現代性」的僵化觀念。肯定「現代性」，是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述現代性，以便對現代狀態作出批判分析，為它的進一步更新而作準備。

當今中國社會中的一些現代現象(政治權力集中的國家、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都市化傾向、新的傳媒和信息方式、科技商品發展及其對傳統文化的削弱，等等)並不說明現代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已得到確立。正相反，文化研究者如果把這些現象就事論事地認定為「現代性」(或者更糟糕，認定為「後現代性」)而看不到這些現代現象本身的非現代性和偽現代性，這恰恰說明現代性思想在他們那裏還遠遠沒有確立。

中國社會生活的非現代性和偽現代性是一個極為需要研究的課題，它包括眾多的方面，套用一句金克木先生的話來說，叫做有官場少公開政治，有商場少公開競爭，有社會少倫理共識，有媒體少輿論作用，等等，等等^①。現代性在中國尚任重道遠。哈貝瑪斯把「現代性」稱作一項未完成的事業，一項未竟的課題，這對我們有着特殊的意義。儘管傑姆遜(Fredric Jameson)在「後現代」問題上和哈貝瑪斯有不少分歧的觀點，但是他承認對於現代德國社會來說，現代性有着一種不能以美國社會現狀來衡量的意義：「在德國，納粹主義切斷了現代(思想)的發展；現代性因此而具有一種未竟事業的性質，於是就有像哈貝瑪斯那樣要求重提現代性的。」^②集權政治不僅阻礙了現代德國的社會和政

治民主化進程，而且也侵襲了它的政治文化。即便在西方，「現代性」的緊迫感尚且因不同社會而異，更何況在與西方有着很大差異的第三世界。

薩伊德(Edward Said)是一位對「後現代」思想十分熟悉的理論家，他反對把「後現代」當作一種共時性模式套用到第三世界社會的當今時期中去。他指出，「後現代主義」與西方反歷史的無力感、消費資本主義等是聯繫在一起的，在這個時期出現了種種冠之以「後」的思潮和理論。薩伊德借意大利哲學家伐蒂莫(Gianni Vattimo)的說法，將它們稱作為「現代末期」的「疲軟思想」。他認為，這種「後現代主義」在第三世界並沒有存在的條件。阿拉伯、伊斯蘭的藝術家和知識份子所關心的仍然是「現代性」問題：「現代性非但沒有過時，而且，對那種至今仍受傳統和正統思想控制的文化，現代性乃是一種主要的挑戰力量。在加勒比海、東歐、拉丁美洲和印度次大陸(第三世界)是同樣的情況，對抗傳統和正統思想控制的文化活動是與本土知識份子所從事的具有世界意識的文化活動相互銜接的。」他們關於「現代」和「後現代」的討論，關係着一個緊迫的問題，那就是「我們要如何現代化」^③。

三 「後新時期」概念和傑姆遜

「後新時期」理論家特別強調傑姆遜的後現代理論對「後新時期」理論的影響。郭建在〈文革思潮與「後學」〉一文中也特別提到了傑姆遜對中國「後學」的影響。他還提到由於理論在差異極大的歷史社會環境中的轉移，會

中國社會生活的非現代性和偽現代性是一個極為需要研究的課題。套用一句金克木的話來說，叫做有官場少公開政治，有商場少公開競爭，有社會少倫理共識，有媒體少輿論作用。

傑姆遜承認，對於現代德國社會來說，現代性有着一種不能以美國社會現狀來衡量的意義。即便在西方，「現代性」的緊迫感尚且因不同社會而異，更何況在與西方有着很大差異的第三世界。



出現思想內涵和政治傾向的「變異」現象^④。這種現象特別值得我們警覺。這種變異無一定規律可循，它可以是積極的，也可以是消極的，這要看它在新環境中所起的特定歷史社會作用而定。這也就是我們為甚麼特別強調理論家不能沒有社會變革意識，不能不分析和確定實際生存環境的基本壓迫結構和對抗關係，不能不在運用理論時表達明確的社會政治理念。而這些正是中國「後學」所缺少的。

理論或思想「變異」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理論或思想與它所移入的新環境的現存社會政治制度的關係。例如，毛澤東思想在民主社會中並不會造成無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民主」和「人權」在專制制度下卻很難不變異為有名無實的口惠。我們必須把思想、理念、理論同它們的社會性運用區分開來，

單單新思想並不能自動形成社會文化批判。新思想往往是每個社會中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力量爭奪解釋的對象，它們都會力爭將符合自己利益的社會形式賦於新思想。現存的社會政治制度往往決定了誰對思想理念的社會性和體制性轉化具有控制權。我們不能脫離「怎麼用理論」、「為甚麼用理論」和「在甚麼制度中用理論」來談「用甚麼理論」。那麼傑姆遜是怎麼用、為甚麼用和在甚麼制度中用「後現代」理論的呢？「後新時期」理論家們又能否從這種方面去理解傑姆遜？

在傑姆遜那裏，「後現代主義」不是一個經驗性的描述概念，而是一個為批判目的服務的「協調性」概念。這個概念使得社會文化批判者可以把特定時期的文化現象與社會制度聯繫起來，通過社會制度來認識文化現象，並從文化現象來認識社會制度的歷史

性質。傑姆遜在《後現代主義或晚近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一書中特別談到了「後現代主義」的命名問題。他指出，批評家「從歷史中看到斷層還是延續……並不能由經驗去證實或用哲學去辯解，這是因為起始性的敘述行為本身決定了它對於那些被敘述的事件的看法和解釋」^⑤。批評家若先設定某個歷史時刻是一個「新」(或「後」)時期，那麼他就自然而然地會按此思路，把那個時期的事件「看作」和「解釋為」「新事物」，並且反過來用它們證實他先前的假設。批評家對歷史的分期，應當是一種自覺的目的行為。「如何命名」和「為何命名」是分不開的。傑姆遜接受「後現代」，是從批判晚近資本主義這個目的出發的。傑姆遜曾不斷強調「後現代」是一個幫助他把當今「文化產品」和「社會制度」「協調性地聯繫起來」的概念^⑥。對「晚近資本主義」這種社會制度的命名，才是對「後現代」這個歷史時期命名的核心。對傑姆遜來說，「後現代」所提供的並不只是一個用於評點某些文學藝術「新」現象的方便術語，而且是一種對晚近資本主義制度作「認識測圖」(cognitive mapping)的途徑^⑦。這種「認識測圖」能使人們對「習以為常的事物重新認識，進而提出改變的設想，提出新的視角，對因循守舊的感情和價值作一番清理」^⑧。傑姆遜觀察具體文學藝術現象，是要從意識形態和倫理的角度對它們所處的社會制度作出分析評斷。他早在1983年關於後現代文化的論文中就明確地指出，他之所以關注「後現代」藝術的「雜拼」、「模擬」和「分裂」等特徵，是為了舉例說明「後現代主義是以何種新方式來

表現晚近資本主義這一新出現的社會秩序的本質真情的」^⑨。我們現在那些喜歡引用傑姆遜隻言片語的「後現代」理論家專事尋找中國當前文化中的「雜拼」、「分裂」現象，但恰恰忘記了要用它們去說明甚麼樣的社會秩序、甚麼樣的「本質真情」。

與傑姆遜對「後現代」概念的說明和運用相比較，我們發現目前的「後新時期」是一個經驗性的概念。它雖具有編年史的合理性(時間的自然順序)，但並沒有真正的政治文化批判價值。它將一個名號賦於一些文化現象，但卻不能把這些現象與特定的社會政治環境聯繫起來。例如，王寧在論及「後新時期」的批評時，指出這個時期的批評大致有四種力量共生：一是80年代以來的規範批評(歷史批評)，二是學院批評(尤其是「語言轉向」)，三是印象鑒賞批評，四是一般通俗批評。單從現象描述來說，這話原本是說得通的。但他作此描述的目的是將「後新時期」的「多元」與「新時期」的「一元」形成對比。他的結論是：「以前(指「新時期」)的一元格局徹底結束。」^⑩這麼一說就不對了，因為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在「新時期」批評中找到這四種批評中的任何一種。不僅如此，王寧的說法還混淆了「多元」的意義。傑姆遜在論述後現代文學藝術特徵的時候說明，他所指出的後現代特徵幾乎都可以在現代藝術中找到。區別現代和後現代的並不是那些特徵本身，而是其他的因素，尤其是它們與「特定社會制度的深層邏輯」的關係^⑪。真正的多元應當指理性討論的自由和寬容的公眾空間。在當今中國許多敏感問題(如民主、人權和「反右」、「文革」、「六四」這類歷史事件)尚不能觸及或深及的情況下，即

我們現在那些喜歡引用傑姆遜隻言片語的「後現代」理論家專事尋找中國當前文化中的「雜拼」、「分裂」現象，但恰恰忘記了要用它們去說明甚麼樣的社會秩序、甚麼樣的「本質真情」。

「後學」理論家以國際壓迫關係來取消本土壓迫關係對於第三世界人民實際生存處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它順應了第三世界中具有壓迫性的官方權力利益，成為官方民族主義和威權內政的文化闡釋人。

便有了某些形式，是不是可以稱得上真正的「多元」？

傑姆遜對「後現代」的命名是以他對「晚近資本主義」這一社會制度的命名為核心的。對「資本主義」的命名不只是一個「名號」或者「代碼」，而且是對它的非道德性（即「歷史性」）所作的最大限度的概括。傑姆遜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因此他所使用的「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也就必須放到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去理解。使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的社會學理論當然不止馬克思主義這一種，但馬克思主義運用這個概念時的特殊價值取向和道德譴責性，使其運用具有特殊的政治和思想批判意義。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分析是同它改變資本主義、解放人類這個道德目標分不開的。

傑姆遜對「後現代主義」的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說，是為了闡述「晚近資本主義」時期特殊的「文化控制」，並由此而設想與之對抗的可能。儘管不少傑姆遜的批評者認為他對「資本主義」的總述給對抗留下的空間太小，但他始終堅持^②：

我之所以作這樣的分析，完全是因為我堅信，除非我們知道甚麼是壓制和權力，否則必然不能估計對抗是否有效。

正是從對批判現存社會制度和它的文化控制着眼，傑姆遜認為，「後現代」這個名稱把文化現象和社會制度「協調」起來，起到了「歷史重構」的作用。傑姆遜說^③：

歷史重構是提出整體的特徵和假設，對當下事物的紛雜混亂作出抽象的概括，是對此時此地的激烈的介入，也

是對它所包含的盲目宿命觀點的抵抗。

歷史重構也就是指出特定歷史時刻的非永存性及它的特殊壓迫形式和非道德性。

我們發現在「後新時期」理論那裏，所缺少的正是這樣一種「歷史重構」的意識，這樣一種道德力量。它不僅不願意承認1989年不可替代的歷史終結和起始意義，而且還迴避1989年以後中國特殊的結構性壓迫和社會衝突關係，把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權力不平等關係確定為中國人生存處境的壓倒一切的壓迫形式，從而暗示在中國，不同階級、群體、等級的人們只有相同的「被壓迫」地位和相同的政治利益，而人們已不再需要去正視和抗爭強暴和壓制。「後學」理論家以國際壓迫關係來取消本土壓迫關係對於第三世界人民實際生存處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它順應了第三世界中具有壓迫性的官方權力利益，成為官方民族主義和威權內政的文化闡釋人。我們在這種情況下批評「後學」在中國的消極政治傾向，所着眼的正是它自覺或不自覺的理論話語效果。

註釋

① 張頤武：〈闡釋「中國」的焦慮〉，《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5年4月號，頁128。

② 張頤武：〈後新時期文學：新的文化空間〉；趙毅衡：〈二種當代文學〉；王寧：〈繼承與斷裂：走向後新時期文學〉，《文藝爭鳴》，1992年，第6期，頁9-10；10-11；11-12。

③ 王寧：〈後新時期與後現代〉，*《文學自由談》*，1994年，第3期，頁53-55；張頤武：〈反寓言／新狀態：後新時期文學新趨勢〉，*《天津社會科學》*，1994年，第4期，頁57-63；張頤武、王寧、劉康：〈後新時期的文學批評：當代文化轉型的一個方面〉，*《作家》*，1994年，第6期，頁71-74。

④ 見註②，張頤武，頁9-10；並見註③，頁63、58。

⑤ 見註②，張頤武、王寧；見註③，王寧，頁37。

⑥ 對「發生」、「規範」和「起始關係」概念的詳細討論見Dick Howard: *The Politics of Critiqu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Howard特別提到了「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這兩個「事件」的「發生」和「規範」，以及這兩者所形成的「起始關係」和西方的「現代」或「現代性」概念的關係。認識中國的現代性問題，也需要從其自身的歷史「起始關係」着手。在西方，具有批判意識的「後現代」理論把60年代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女權運動和歐美廣泛的學生反體制運動等確定為最有意義的事件，西方激進文化批評至今仍能感受到60年代「起始關係」的影響。相反，正如Sohnya Sayre, Anders Stephanson, Stanley Aronowitz和Fredric Jameson等人所指出的，西方保守政治勢力的文化策略則總是包括「對60年代的糟蹋」。見Sohnya Sayre, et al. eds.: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 9。

⑦ 王寧：〈「後新時期」：一種理論描述〉，*《花城》*，1995年，第3期，頁202。

⑧ Jürgen Habermas: "What Does a Legitimation Crisis Mean Today? Legitimacy in Late Capitalism", in William Connolly ed.: *Legitimac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 134-35。

⑨ 筆者對「後現代」在特定條件下的批判作用，尤其是與民主政治的關係，已另有討論，見〈後現代、後

殖民批判和民主政治〉，*《傾向》*，1994年，第2、3合期，頁172-201。

⑩ Ernesto Laclau: "Politics and the Limits of Modernity", in Andrew Ross ed.: *Universal Aband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p. 65。

⑪ 王蒙：〈官場無政治？〉，*《文學自由談》*，1994年，第4期，頁40。

⑫⑬ Anders Stephanson: "Regarding Postmodernism: A Conversation with Fredric Jameson", 見註⑩ Andrew Ross, pp. 23; 11。

⑭ Edward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p. 329。

⑮ 郭建：〈文革思潮與「後學」〉，*《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6年6月號。

⑯⑰⑱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xiii; xiv; 415; xiv; 400。傑姆遜對「後現代主義」論述最詳的是"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Hal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Seattle: Bay Press, 1983), pp. 111-25; "Postmodernism, or, the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 no. 146, pp. 53-92。

⑲⑳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in Hal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Seattle: Bay Press, 1983), 113; 123。

㉑ 見註③，張頤武、王寧、劉康，頁73。

徐 賁 1982年復旦大學文學碩士，1991年獲麻省大學 (Amherst) 哲學博士。現任加州聖馬利亞學院英文系副教授。